**第七章**

**语言** **文化** **社会**

语言学界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早已达成一种共识，普遍认为语言是文 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对语言产生本质性的影响。实际上，对语言与文 化关系的探索虽然古已有之，“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才开始集中力量， 注重社会文化语境中语言现象的研究”(Apte,1994:2000)。

为了说明这种学科范式的流变过程，本章择其要点，集中讨论语言、文化、 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为了体现社会语言学应用性的特色，反映出社会语言 学的跨学科特征，我们还新增了一节内容，介绍跨文化语境中的交际问题。显 而易见，这种篇章结构的安排，目的在于了解社会语言学，为语言学研究提供 一种新视野。本章的内容要点，涉及以下四个方面关系的讨论：1)语言与文 化的关系；2)语言与社会的关系；3)语言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4)文化在标 识译写中的表现。①

**7.1** **语言与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文化通过语言得以凸现，其 表现力得到充分展示。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既有助于拓宽人类的知识范围， 又有利于丰富语言学和文化学研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这种相关性研究，也 有双重性的特征，既引人入胜，又充满挑战，大有认真研讨的必要。

**7.1.1 语言与文化的相关性**

毋庸置疑，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紧密。回顾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即可发 现大量实例，证明这种说法的公理性。18世纪以来，语言学研究，从本质上讲， 具有历史比较和结构分析的特征。20世纪20年代之后，出现了两支不可忽视 的语言学流派，为日后社会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支是源于马 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 成于弗斯(Firth) 的“功能学派”或“伦敦学派”;



①考虑到双语标识在中国语境中的重要性，本章在新版的中文版教程中增加了一个小节， 专门讨论双语标识译写在文化中的表现。

另一支是以博厄斯(Boas)、 萨丕尔(Sapir) 为首的北美人类语言学派。

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在新几内亚东岸特罗布里恩群岛 (Trobriand Islands)的田野调查工作中注意到一种有趣的现象。这种现象表 明，在一种特定的语言文化中，任意一种语言形式可能包含着若干义项；其中 的一些语义关系，只有在特定的语言使用环境中，才能为外来文化所理解。例 如，在特罗布里恩土著文化中，“树木”这个词，既可指一般的树木，也可以指 独木舟。离开了具体的使用语境，来自异文化背景的欧洲人，往往对此现象一 筹莫展，无法解读。基于这一发现，马林诺夫斯基声称，“在原始用法中，语言 在协同人类活动中起着纽带的作用……语言不仅通过交流概念而成为一种表 达思想的工具，而且是一种可以建立人际关系的行为方式”(Sampson,1980:

224)。马林诺夫斯基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的语言学思想强调语境重要性这 一点。不过，马林诺夫斯基对于语境的论述，多半具有一种探索的性质。大 约过了30年之后，语境理论在“伦敦学派”的创始人弗斯那里才得到了实质 性的发展。弗斯语境说的一些概念，后来又在北美社会学家那里得到进一步 的重申与印证，最终语言与语境的研究日益广布，成为早期社会语言学研究 的一个主要内容。弗斯对于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影响，是他根据马林诺夫斯基 关于语境的基本看法，首次以比较完善的方式，阐述了说话人、语言形式、语 言环境等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开创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说”(Theory of Context of Situation)。他的语境说，可以通过下列模式进一步具体化(Palmer, 1981:53-54):

A. 参与者的相关特征，个人与个性：

(i) 参与者的言语行为；

(ii) 参与者的非言语行为。

B. 相关的话题内容。

C. 言语行为所产生的效果。

由此可见，同萨丕尔一样，弗斯的语境说旨在说明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创 新性和多样性特点(参考Darnell,1994:3655)。 不过，弗斯的语境理论所 包含的一些内容与概念，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沉寂，到了20世纪60年代 末，才在一些社会语言学家的著作中找到某种关联与回归。社会学家费什曼 (Fishman,1972:46) 提出一条格言警句式的定律，说明社会语言学的内涵与 外延：社会语言学研究什么人说什么、对谁说、何时说，以及为何说的问题。 不难看出，这两种理论虽然说法不同，精神实质却十分接近。20世纪60年代 以后，由于韩礼德在符号学、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杰出贡献， 伦敦学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在符号学方面，他提供了一种社会符号学 或交互学的新视角。在语法研究中，他强调功能语法观，认为语法体系是一个 体现意义潜势的选择系统。他所构建的语言学分析模式，在文学作品的研究中，

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Downes,1998)。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北美的语言学家在语言和文 化关系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实质性的贡献。事实上，当 谈到美国的语言文化研究时，自然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事 实：美洲印第安文化为早期北美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 丰富的语料素材。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美国人 类学家如博厄斯、萨丕尔、沃尔夫，进行了一项紧迫而重 要的工作——重建美洲印第安语。通过这项工作他们意 识到，在语言使用的研究中，文化有着重要意义。通过他 们杰出的田野调查，许多语言材料得到了记录与保存。这 些记录为显示北美印第安人在日常交际中选择的语言形

式如何与人际关系相互联系这一点，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证据。这一点如果没 有得到恰当的描写或正确的理解，要想解释这些语言结构中的诸种变异，几乎 是不可能的。这种语言和文化研究的人类学方法，在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上打下 了深深的烙印，特别是提起“交际民族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这一重要理论时，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早期人类学传统的潜在影响(Hymes, 1972)。交际民族学在语言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值得作进一步 的介绍。

交际民族学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1)言语社团；2)场景、事件和行 为；3)交际民族学模式。判定说话人是否属于同一个言语社团，不但要看成 员之间是否共享一套话语规则，还要看他们是否至少共享一种语言变体形式。 所谓“场景、事件和行为”,是用于研究同一言语社团话语交际行为的一套等 级式的表述结构。其中，“行为”构成了“事件”的主要内容，“事件”又在“场 景”中发生并得以描述。交际民族学的研究模式，是交际民族学的一个有机组 成部分，含有八个方面的内容：1)场景(situation);2) 参与者(participants);

3.)目的(ends);4) 相关形式与内容(act sequence);5)语 气(key);6) 语式 (instrumentalities);7) 准 则(norms);8) 体 裁(genres) 。 为了记忆上的方

便，英语的说法采用了首字母缩略法，简称为SPEAKING Mnemonic(Fasold, 1990:39-46;杨永林，2000:23-24)。

谈到语言文化研究传统，不可避免地要提到美国人类语言学的重要人 物——沃尔夫(Whorf) 和他关于语言、思维和文化的著名假说。沃尔夫从20 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作为一名业余语言学家，开始对语言学、人类学和考 古学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在耶鲁大学旁听了萨丕尔所开设的一些语言学课程， “在他自己的看法和萨丕尔的观点之间，找到了相同之处，产生了独特的共鸣” (Stam,1994:4983) 。 沃尔夫的这种求学经历，加上自己对于印第安豪皮(Hopi) 语的研究，使其对语言相对性理论有了独特理解，最终形成了著名的“**萨丕尔-**

**沃尔夫假说** ”( Sapir-Whorf Hypotheses)。这个假说认为，语言塑造了我们的 思维模式；相应地，不同的语言表达决定了人们认识世界方式的不同。从这个 观点出发，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方面，语言可以决定我们的思维方式；另一 方面，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是相对的，结构性差异越大，反映出对于世界的认识 越不同。因此，这个假说也被称作“**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 和“**语言相对主义** ”(Linguistic Relativity)。实际上，这种看法“最早是由德 国民族学家洪堡特提出并加以阐释的”(Crystal,1985:262)。

回顾语言文化研究的历史，有必要简述奈达(Nida) 的一些精彩观点。作 为一位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奈达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十分关注。针 对语言文化关系的研究而言，他的观点意义非凡，具有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 贡献。多年来，奈达一直从事《圣经》的跨文化翻译工作。这方面的丰富实践 经验，使他深刻认识到，作为一个翻译家，如果想出色地完成跨文化交际的任 务，有必要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注重以下五种文化的表现：1)生态文化；2) 语言文化；3)宗教文化；4)物质文化；5)社会文化(Nida,1964)。

**7.1.2**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如上所述，这一假说认为，不同的语言有助于形成人们对于世界的不同看 法。不过，现在很少有人全盘接受这一理论的初始观点。事实上，随着时间的 流变，这一假说从原来的初始形式中，逐渐衍生出了“强式”和“弱式”两种 理论模式。强式之说，指的是这一理论的初始假说，即强调语言在塑造人类思 维方式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弱式之说，则是对于初始假说的修正，认为 语言、文化和思维之间有相关性，但是思维方式的跨文化差异是相对的，不是 绝对的。

回顾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研究，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发展 过程，其间充满了论争与反诘、挑战与应对。譬如说，有些研究声称，已经找 到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正确性。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研究则提出同样有力的 证据指出其谬误之处。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局面，必须尊重事实，仔细研究， 科学求证，避免妄断。以下通过两个具体的语言学研究案例来说明这种研究 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第一个案例来自北美印第安语族中的豪皮语；第二个 案例取自巴布亚语中的丹尼(Dani) 语。前者为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提供了一个 极好的例证；后者为语言进化论的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

同大家熟悉的语言相比，豪皮语有一个奇特之处：它的语法系统中缺乏 抽象时间概念的表达形式。“一段时间(a length of time)这个概念，在豪皮 语中被想象为同一单位时间的系列组合，就像一个个排列起来的玻璃瓶一 样。”(Whorf,1956)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豪皮语又被称为“没有时间的语言”

(timeless language)。对此现象，语言学家桑普森(Sampson,1980:86) 进 一步评述道：

豪皮语里，时间不是呈现为一种线性的维度，可以像空间那样作为单 位来分割和度量……此外，豪皮语里也没有可以同欧洲语言相匹配的动 词时态系统。因为没有时间概念，因此无法形成表达距离与时间之比率 的速度概念，所以豪皮语里没有表达“迅速地”(fast)这个意思的相同说 法。英语句子He runs fast, 充其量只能翻译成一种近似的说法He very

runs。

虽然豪皮语中没有相应的表示时间概念的语言形式，但是对于本族人而 言，决不意味着“现在、过去、将来”这些时间概念并不存在。从功能上说， 也不意味着缺乏相应的语言表达。针对这些有趣的跨文化差异现象， 一个需 要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是：假定豪皮语文化中产生出一位极富创新精神的物理 学家，那么他对相对论的表述同爱因斯坦的有何区别?毫无疑问，如果情况果 真如此，那么这位物理学家肯定也会找到方法，用其独特的表达形式阐述自己 的理论。同样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还有：如果这样，他所采用的语言表达方式 同我们所熟悉的其他语言有何不同?这些问题的提出表明，在处理跨文化问 题时应当小心谨慎，不能简单采用“从特殊到一般”的做法，用单一的标准来 推断评价其他语言体系。

事实上，沃尔夫在豪皮语的对比研究中，由于采用了“平均标准欧洲语言” (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SAE)作为比较的基准，因而招致了非议。诸种 现象表明，从语言普遍性的角度思考问题时，难免会出现使用不同标准研究相 似性的问题。语言普遍性的研究是一个重新分类的过程，不能用一个现成的 语言模型作为标准推及其他。以观察和比较的便利性而言，在探讨语言普遍 规律时，有必要从其相似性开始，而不是从其差异性入手(Greenberg et al., 1978)。总体而言，豪皮语的讨论为支持文化相对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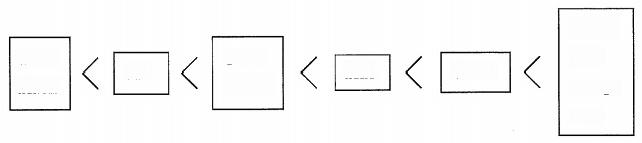
丹尼语的情况恰恰相反，说明了语言普遍性的存在。1969年，两位美国

学者携手合作，发表了半个世纪以来色彩语码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专著《基

本色彩词汇：普遍原则与进化过程》(Berlin&Kay,1969) 。 通过实证研究 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柏林与凯考察了98种语言的色彩语码系统，揭示 出色彩辨认与语码匹配之间许多有趣的现象。其中，最主要的发现有两点：

1)11个基本色彩词语构成了人类语言色彩语码系统中的一种普遍性原则；

2)这11个基本色彩词语，按着严格有序的进化过程出现在不同语言系统之中， 见图7- 1。



purple pink orange gray

blue brown

green yellow

white black

red

Stage:I II III IV V VI

**图7** **-** **1** **基本色彩词语进化阶段(Berlin&Kay,1969:4)**

根据图7-1所示内容， 一种语言如果有“黑、白”两个基本颜色词，它就 处于色彩词语进化的第一阶段；如果有“黑、白、红”三个基本颜色词，那就 处于色彩词语进化的第二阶段，依此类推。英语里有11个基本颜色词，所以 处于基本色彩词语进化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理论概括的好处是，从跨文化 比较的角度说明了基本色彩词语的普遍进化过程。柏林和凯发现，在所有被 考察的98种语言中，基本色彩词语只有大约30种组合方式，数目从2个到 11个不等。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普遍性原则，那么11种基本色彩词语的自由 组合，可以产生多达2000种表现形式。

丹尼语因为其独特的基本色彩语义系统，受到语言学界普遍的关注。20 世纪60年代，研究者发现，丹尼语中仅有黑白对立两个基本颜色词：modla 表示“白色”,mili 表示“黑色”。依据色彩语码进化论的分类标准，丹尼语只 有“黑、白”两个基本颜色词，所以处于基本色彩词语系统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Berlin&Kay,1969)。 由于具备了这样一个特征，丹尼语为语言学家提供了 一个不可多得的实例，用以验证基本色彩词语进化论观点的可靠性。针对丹 尼语基本色彩词语系统中的特殊现象，结合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讨论，我们 难免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丹尼语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表示“黑一白”以外的 语义对立，进而展现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表明， 丹尼语虽然仅有两个基本颜色词，但是相对于其他语言来说，这两个基本颜色 词具有更为深厚的内涵和更为宽广的外延。在丹尼语中，modla 和 mili 这两 个词语所表达的意思，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而言，除了表示不同的色度对比之 外，还形成了色调的冷暖对立。换言之，前者可以表示“白色+暖色”的语义 范畴，后者可以用来指代“黑色+冷色”的概念表达，由此构成“白暖色系列” 与“黑冷色系列”(white-warmness VS.black-coldness)这种独特的语义对立。

由此可见，丹尼语通过“白”与“黑”的对比，可以传达本族人对颜色感 知的多样性信息。 Modla 作为一个普遍性的色彩词语包含了所有的暖色语义， 如红色和黄色；mili 作为另一个概括性的色彩词语则覆盖了所有的冷色语义， 如蓝色和绿色。因此，modla 和 mili 之间的对比，事实上是“白暖”和“黑冷” 之间的对比，而非简单的“白”与“黑”的对比。这一现象表明，通过“白暖” 和“黑冷”的对比，加上其他类型色彩词语的用法，如源于事物名称、动物、

植物等的色彩词语，丹尼语和其他语言一样，也可以成功地表达世界上的任何 一种色彩。由此可见，考虑到语言使用的情况，丹尼语的个案研究表明，语言 相对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语言文化问题。

理论语言学研究表明，新世纪的语言学理论研究，最有可能通过跨学科、 认知科学和进化论的视角取得突破性进展(Hauser,et al.,2002)。人类语言 学研究表明，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对于分析解释来自异文化的差异现象仍然 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认知科学家(Gibson et al.,2017)却发现，尽管文化不同， 人们在日常交流中更加偏向于使用暖色系词语(红、黄、橙)而非冷色系词语 (蓝、绿)。显而易见，学术界的这些新发现、新变化，代表了一种充满理性的 折衷主义思潮，为语言科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活力与新元素。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全盘否定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为时过早，尚不足取。

**7.1.3** **个案研究**

语言与文化关联性的研究汗牛充栋，大到篇章研究，小到语音分析，从不 同的语言结构分析层面说明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说到语言学习中的文化因 素研究，最为著名的当数卡普兰(Kaplan,1966) 关于文本结构与文化差异的 相关性假设。此外，中国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反事实假设”(counterfactual condition) 的问题，也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 因为汉语语法缺乏明显的“反事实假设标记(虚拟标记) ”(counterfactual

marking), 所以中国学生不擅长虚构假设的推理模式与语言表达(Bloom, 1981)。另一方面，大量语言学研究结果表明，说话人的方言差异与发音的不 同，不仅传达一种地理学意义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不同的社会文化 底蕴(参考Labov,1966;Levey &Harris,2002)。不论是“标准英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 or Standard British,RP),还是“标准美语”(General American or Standard American,GA),对于听话人来说，都传递着不同的社会信息。标 准英音，是受到良好教育的表现；标准美语，含有良好教育与开朗随和的底蕴。 带有外国口音的英语，对于本族人而言，也会产生诸如优雅、粗俗等社会心理

的影响。

语言与文化关联性的讨论，目前尚无法取得完全一致的见解，但是这种 探讨为考察习惯用语、研究比喻用法在特定文化背景中的含义，提供了一个绝 好的跨文化对比机会。这也说明为什么奈达在讨论词汇、语义、翻译、文化问 题时，特别提出词义受“习语支配”、具有“文化特征”的观点(Nida,1998:

32-45)。此外，这种对比分析还说明，隐喻研究已经发展成为探索语言、认 知、文化关系过程中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Lakoff &Johnson,1980), 值得深 入研究。

每一种语言中都存在着大量“习惯用法”(idiomatic usage),其中又有不

少是含有鲜明文化色彩的比喻用法(culturally-specific metaphorical use)。 这些语言形式，对于来自其他文化传统的语言学习者来说，往往成为语言学习 中的“拦路虎”。

下面两段对话都是发生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语境之中的，有比较高的参 考价值。第一段对话，是笔者在美国学习期间同美国教授的谈话；第二段对话， 是笔者同美国房东之间的闲谈。援引语言生活小插曲的目的，是想通过个人 在美国文化中的生活经历，结合社会语言学分析，展示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紧密 联系，为语言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一种不同的考察视角。

(1)美国英语中，get your hands dirty 这条短语绝不是如字面含义所示， 表示“弄脏自己的手”的意思，而是一种含有特定文化底蕴的比喻用法，意 思是“身体力行地做事”。下面这段对话，是笔者同一位美国语言学教授的闲 谈。时间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地点是美国康州中央大学英语系Tulai 教授的办 公室：

Prof.Tulai:To do research means to get your hands dirty.

Prof.Yang:So you think teaching is worthier than doing research? Does the phrase“to get your hands dirty”have some pejorative connotations?

Prof.Tulai:Oh,no!I didn't mean that.When I was saying that, I simply meant“you are practicing something”or“you are engaged in doing something”.

(2)Dumbbell 的字面意思为“哑铃”,是一种健身器具。但是在日常口语 中，如下面对话内容所示，它还可以表示另一层比喻意思。下面这段对话，是 笔者同美国房东Goodell先生一起打扫卫生时的闲聊。时间是一个冬日的周末， 地点是客厅隔壁的厨房：

Mr.Goodell:I guess I'd better put them in the garage.I've had enough dumbbells in my office.

Mr.Yang:Really?Can you do dumbbell practice in your office?

Mr.Goodell:Definitely not!I was joking.What I really meant is that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stupid guys in my office.

**7.1.4** **文化在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豪皮语的时间表达、丹尼语的基本色彩词语的用法，以及美国社会 文化中的习语用法凸现了文化在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那么下面的讨论 将有助于我们通过考察英语新词构成演变的过程，进一步加强对语言文化关

系的理解。显而易见，采用“解剖麻雀，以小见大”的分析方法，观察活生生 的语言使用过程，不但有助于凸现语言变化与社会文化的紧密关系，而且可以 加强对语言变化动因和发展方向的理解，达到促进语言学研究的目的。

1.词语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最终导致尼克松政 府倒台的“水门事件”(the Watergate Event)。时至今日，此事已成历史，当 事人也已作古。不过，这一事件对于美国社会政治、语言文化方面的影响，却 是经久不衰，依然深刻。事实上，在过去的40多年里，源于“水门事件”政治 丑闻的Watergate 一词已经风靡全球，家喻户晓，其复合成分-gate 也随着更多 政界要员丑闻、跨国行贿大案、大宗金融诈骗、总统桃色事件的出现，逐渐演 变成为当代美国英语中一个最为活跃能产的构词成分。单就美国前总统克林 顿的桃色事件，就产生了诸如Fornigate,Monicagate,Double entendre-gate, Tailgate,Interngate,Lewinskygate,Zippergate 等一大批新词新语，极大地丰 富了当代美国英语的表现力(Glowka &Lester,1997)。其他诸如 Billygate (比利门),Debategate (辩论门),Cattlegate (牲畜门),Ricegate (大米门)等。 1996年，以-gate 结尾的复合词语入选美国社会最为流行的年度新词。

结合语言文化关系的讨论，美国英语中复合成分-gate 及其合成词语的研 究具有双重价值。首先，作为特定历史事件的产物，在短短40多年的时间里 派生出如此众多富有文化色彩的英语新词，这在所有英语复合成分及其变体 中史无前例，绝无仅有。其次，Watergate一词丰富的经历本身，为语言学家提 供了一个最新、最完备的实例，用以考察英语新词构成嬗变过程中文化因素的 作用与影响。有例为证。

“水门事件”以来，世界政治舞台风波不断，丑闻迭出。在这种情况下， 这一复合成分早已走出美国，用以泛指任何一个国家权势人物见不得人的肮 脏交易，大有演变成为一个全球性政治词语的势头。例如，韩国的朴正熙集 团试图收买美国国会议员，以便对国会施加影响的做法，被称为“韩国门” (Koreagate)。 又如，南非新闻总署主任马尔德(Mulder) 因非法挪用公款资 助不明活动，最终导致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几位部长辞职一案，被冠以“马 尔德门”(Muldergate), 成为表示南非政界丑闻的一个新名词。再如，绿色 和平组织“彩虹勇士号”的沉没，被新闻界称作是一起“法国的水门事件”(a

French Watergate)。诸如此类的跨文化类推现象数目繁多，举不胜举。时至 今日，有理由认为，复合成分-gate已不再是一个仅限于美国本土的社会文化 现象，而是一种国际化的符号标记，用来泛指各类同政界要员、社会名流有关 的欺诈行为(杨永林，2004b:34-4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在“文化模因”(cultural memes)和“波

浪理论”的助推作用之下，加上新闻媒体与网络传播的促动，源自“水门事件”

丑闻的复合成分-gate 被直译为汉语的“门”字，在完成了“汉化”或者说“模 因化”过程之后，作为公众人物各类丑闻的代名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滋生能 力，在中国新闻文本与话语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例如，“秘书门”“电话门”“窃 听门”“虐女门”“抄袭门”“裁员门”“籍贯门”“商标门”“非礼门”“裸照门”“煽 情门”“黑客门”“贿赂门”,应有尽有，数不胜数。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说，通过对 Watergate 一词及其家族成员的分析讨 论，可以得出五点结论：

1)作为当代英语中极富滋生能力的复合成分， -gate 将会继续存在，并繁 衍出更多家族新成员；

2)复合成分-gate 专指政界要人、社会名流丑闻劣行的文化底蕴，将会保 持不变；

3)经过“换称”和“转化”两种构词方法的筛选与稳固，Watergate 作为复 合成分-gate 的鼻祖，将会在英语中长久存在；

4)有理由相信，Watergate 所含的社会语义，在“文化模因”的助力之下， 在世界范围内会逐渐传播开来，蔓延下去；

5)完成了“汉化”或“模因化”过程的附着成分“门”字，在中国新闻语 境中频繁使用的现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持续下去，继续演绎“千门 万门，同出一门”的语言学故事(杨永林，2008)。

2. 称谓进行时

众所周知，不论何种语言，相对于词汇的剧烈变化而言，其称谓系统一般 都比较稳定。不过，汉语的称谓系统近来却发生了一个新变化：“亲”和“亲们” 用作称谓语。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新变化值得关注。

我们注意到，这一新变化是受到电商的促动而快速传播开来的。所以，这 种用法又被称为“淘宝体”。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有下列几个 方面的特点。

从形态上来看，“亲”是源于“亲爱的”这一固定说法的。虽然后者本身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种缩略说法却很新奇。从语义上来说，即便作为一 种称谓语，“亲爱的”也仅限于夫妻、恋人、家人、好友之间，基本上不用于陌 生人之间。基于这种分析，“亲”作为一种新兴的称谓用法，确实有其可圈可 点之处。首先，能够从“亲爱的”结构中分离出来，自立门户，就很不易。其次， 从原来仅指亲密关系，到现在泛指他人的语义变化，也堪称奇。最后，还能以 复数“亲们”“众亲”甚至“众亲们”的形式呈现，则更为新奇了。仅此一例， 即可看出语言与社会共变的道理来。

除了“亲”和“亲们”的兼类用法之外，现代汉语还出现了名词用作称谓 语的现象。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美女”与“帅哥”了。这一对词语，从 传统意义上而言，有三个专门属性：

1)从词性上而言，属于名词的类别；

2)从语义上来说，具有年轻貌美的底蕴；

3)从文体上来看，多用于书面语或文学体。

从社会语言学来看，这种词语跨类的新变化，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

1)从词性上而言，可以兼类用作称谓语；

2)从语义上来说，只要性别选择得当，不分年龄，不论容貌，可以用于任 何 人 ；

3)从文体上来看，不论口语还是书面语都可使用；

4)从语用上来讲，话语双方的关系不论远近亲疏，皆可使用。

无独有偶，在过去的40年里，英语的称代系统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其中 有两个显著案例，值得我国英语学习者注意：其一，代词he 不再用于泛指；其 二，出现了一个新的代词形式Ms., 专指女性。这两种新的变化，标志着西方 女权运动在消除语言性别歧视方面的胜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论政 府文件还是学术文本，都不再接受he 用作泛指的做法。同理，除非必要，一 般也不再使用带有婚姻标记的Mrs., 取而代之的是用Ms. 。时至今日，在英语 国家，如果不加区分地继续使用传统的用法，难免会被看作是“大男子主义” (male chauvinism)的表现。遗憾的是，在国内英语教材和大学生英语作文中， 代词he 用作泛指却是屡见不鲜：

1)Everyone should hand in his homework on time.

(每个人都要按时交作业。)

2)As a student,he has to take a good care of his study

(作为一个学生，必须把学业弄好。)

针对这种情况，社会语言学家建议，采取下列方法即可避免语用错误：he or she连用；he/she 并列；选用复数形式we,you or they;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 避免使用代词。

**7.1.5** **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了解一种新的文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理解新文化，做到言行举止得 当，更是难事一桩。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声称，圆满实现这个目标，大概需要 20年左右的时间(Nida &JFL Correspondent,1998)。考虑到文化学习的艰 巨性，为了认识文化知识对于外语学习的促进作用，我们将简述文化学习同语 言教学的关系。

总体而言，就外语学习来说，文化知识的传授至少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 优 点 ：

1)有助于学生了解文化差异；

2)有助于语言学习者跳出自身文化的圈子，从目标文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3)有助于通过各种课堂活动，加深对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性的理解，促 进外语学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共识：对语言学习者而言，大多数情况 下，要想更好地理解目标语言的结构，有必要了解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换言 之，能否成功掌握一种外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真正理解其文化内涵。这 是因为，恰如以上各例所示，文化同语言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密，这在不同层面 都有所体现，不可忽视。

**7.2** **语言与社会**

语言是社会之镜，透过这面镜子，可以更好地展示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 社会是语言之根，置身社会语境，可以切身感受到语言使用的方方面面。语言 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是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出现而广布的，是随着社会语言 学家锲而不舍的追求而被认可的。在过去的50年里，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杨永林，2004a,2004b)。 在这种学术大背景下，社 会语言学为我们了解语言、社会、说话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种全新 的视角，值得介绍。

**7.2.1** **语言和社会的联系**

语言同社会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这种看法可以从古希腊一罗马和古印 度哲学家、语法学家的著作中得到有力的证明(Harris &Taylor,1989;Apte, 1994)。20世纪30年代以来，语言学家试图把语言学研究看作是一门独立的 学科，致力于语言学一元性和自治性的探索研究工作。受到这种主流语言学 观点的影响，整个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的研究几乎都是在脱离了具体的社 会背景和语言使用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构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语言 学的出现，形成了对乔姆斯基理论语言学的反叛，语言学研究的二元观点逐渐 复苏。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由此得到了重视。经过50多年的发展，社会语 言学的百花园里，鲜花吐艳，芬芳满园。我们只能采撷几朵加以介绍。感兴趣 的读者可以参见这方面的专题讨论(杨永林，2004a,2004b)。

**7.2.2** **社会语境中的文体变异**

20世纪60 年代初，语言学家盖耶茨(Geertz,1960) 发现，在爪哇语 (Javanese) 中，说话人可以根据不同的交际情景与事件，选用不同的文体形式 来表现同一种信息内容。爪哇语中，如果要表示 Are you going to eat rice and cassava now?(你现在要吃米饭和木薯吗?)这样一个简单的意思，有下列数

种文体可供选择。这些语言形式的选择，反映出语境与文体的共变特征，展示 了从“随和体”到“正式体”的文体差异。

are

you

going

to eat

rice

and

cassava

now

*apa/napa/menapa*

*kowé/sampéjan/pandjenengan arep/adjeng/dadé*

*mangan/neda/daharé sega/sekul*

*lan/kalijan*

*laspé*

*saiki/saniki/samenika*

这一实例说明，爪哇语言语社团中丰富多彩的文体变异形式不仅仅同语 言形式的搭配有关，更为重要的是，选用何种结构形式还同社会所认可的语言 标准相关联。不同语言形式之间得体和谐的选用与组合，既有形式上的要求， 更有语境与文体上的制约。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结构和语言变体，语言学研究 有必要采用一种形式与功能互补的观察视野，建构整体论意义上的语言学观。

爪哇语的实例表明，不同语言形式的选择是受语境制约的，而语境的选择 又和文体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五度区分是文体研究的经 典理论之一(Joos,1967) 。 根据这个理论，可以通过正式程度的不同，把抽 象的文体概念具体化为五个度量层级：庄重体(frozen)、正式体(formal)、商 洽体(consultative) 、 随和体(casual) 和亲昵体(intimate) 。 例如，请人入座 之时，根据语境场合、双方关系的不同，英语里至少有五种句式可以选择：

1)庄重场合：Be seated,please!

2)正式场合：Would you please take a seat?

3)商洽场合：Sit down,please!

4)随和场合：Sit down!

5)亲昵场合：Sit!

不仅如此，语言形式同社会阶层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变现象。20~~世~~

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在纽约市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语言学调 查(Labov,1966) 。 这项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说话人社会阶层(social status) 同其音位变体(phonological variations)之间的关系。该项研究报 告最终以专著的形式问世，书名为《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分层》。过去几十年 里，这本语言学著作已成为社会语言学变体研究理论的经典之作而被广为引 用。这项调查表明，不同语音变体的使用，绝非仅是形式上的差异，而是隐 含着深刻的社会含义；一种语音形式不但在语音层面上形成了形式上的区别， 而且在用法层面上形成了表意功能的差异。作为一种社会语言学的变量(a

sociolinguistic variable),语音变体形式的不同，反映出说话人阶层、身份以 及语境变化方面的信息内容。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拉波夫所首创的社会语言 学定量分析模式又被称作“定量范式”(the quantitative paradigm)、“社会语 言学本体”(sociolinguistics proper)、“变异研究”(variationist studies)、“都 市方言学 ”(urban dialectology),以及“世俗语言学 ”(secular linguistics) (Mesthrie,1994;Bolton,et al.1992;Milroy,1994;Fasold,1990)。

社会语言学家莱可夫(Lakoff) 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点：“言为身份” (You are what you say)(Lakoff,1991)。通过这一论点的讨论，借助于文体、 语境、社会三者之间的变化研究，可以进一步引进一些社会因素，达到扩展观 察视野的目的。例如，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各种不同的因素发生作用，影响 着我们的言语行为模式。这些因素包括：1)说话人的阶层；2)说话人的性别；

3)说话人的年龄；4)说话人的种族；5)说话人的教育背景；6)说话人的职业；

7)说话人的宗教信仰。以下我们仅择其要，选定性别这一因素，看看这一社 会语言学变量是如何影响语言使用的。

社会语言学调查表明，除了阶层引发的社会变体之外，性别对个人言语行 为的影响也是值得重视的。事实上，人类对于这种关系的认识源远流长，至少 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的戏剧文本中，就保存下来许多反映言语性 别差异的珍贵实例(Gregersen,1979) 。 尽管如此，一般认为，从社会语言学

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思考研究是从莱可夫的“女子英语研究”开始的(Lakoff, 1973;参考 Jesperson,1922) 。 莱可夫采用内省式的研究方法总结了美式英 语中性别差异的诸种现象，由此揭开了女性语言大讨论的序幕。莱可夫断言， 美国文化里有一种独特的女子英语文体形式(women's register),其具体表现 可以大致概括为：委婉文雅；含蓄客气；语气游移；内容琐细。细究起来，女 子英语文体有六个方面的特征：

1)在词语的选择特别是色彩词语的使用上，女性使用的颜色词更多；

2)女性喜用含义空泛、语义虚指的形容词形式；

3)女性善用反意疑问句以及陈述句作为一般问句的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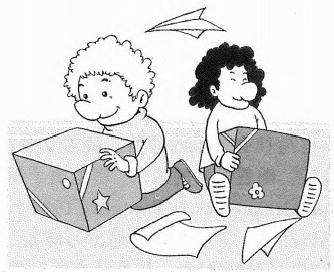
4)女性常用表示语气游移不定的语气词语；

5)so 作为强势语的用法为女性所偏爱；

6)女子英语中出现更多礼貌客气的表现手法，以及矫枉过正的语言形式。 莱可夫进而指出，语言中的这种差异现象，是由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形成

的。这一观点表明，如果试图解决语言性别歧视的问题，必须先改变社会对妇 女的看法。这是因为，不是语言系统本身，而是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导致了她 们言语行为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多半带有“弱势语言”的特色，不是主 流语言模式，所以不为社会所推崇。由此，要想了解语言和社会的关系，不妨

从下列问题的思考开始。 一种语言形 式是否多为女性使用?如果如此，为 何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 言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s)与 语言性别歧视(linguistic sexism)的 研究，一直是社会语言学的热点问题， 讨论的要点，恰如图7-2的文字说明 所示，集中在“本能”与“教养”(nature Vs.nurture) 的二元对立之上。换言 之，女性语言是受生物学机制的影响， 还是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就成了语言 学家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



SEX IS WHAT YOU'RE BORN WITH; GENDER IS WHAT YOU'RE GIVEN.

**图7-2**

**7.2.3** **社会语言学的重要作用**

社会语言学作为一种交叉性、应用型的语言研究，旨在揭示语言与社会的 关系。具体而言，社会语言学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语言结构的分析研 究，二是社会语境中具体用法的考察。借助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考察语言使 用问题之时，也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了解语言与社会的关联；其 二，探询相互关联的内在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语言学首先试图通过 社会语境中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来了解语言结构的问题，其次又通过语言现 象的分析来了解社会构成的问题。

不言而喻，这一双重研究目的，使得社会语言学具有交叉学科和多元学科 的特质(Bolton &Kwok,1992)。这种多元性和多样性特征，也使得社会语 言学的学科边界难以界定。学科交互和领域重叠构成了社会语言学独特的研 究范式。了解社会语言学大厦的构成，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实现：一是层级的划 分，二是类属的划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选择后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又可以 进一步区分为语言社会学(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和社会语言学(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两种不同的视角(Fasold,1984,1990)。

考察社会成员的语言行为，达到了解社会的目的，这是语言社会学需要解 决的问题。换言之，这是一种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在这个层面上， 可以讨论的内容有：双语问题、多语现象、语言态度、语言选择、语言保持、 语言流变、语言规划、语言标准、语言政策等等。

考察语言结构的社会含义，了解语言变体现象，提供语言功能的说明，这 是社会语言学需要考虑的问题。换言之，这是一种微观层面上的社会语言学 研究。在这个层面上，可以研究的问题有：结构变化、称谓形式、性别差异、 话语分析、洋泾浜语现象、克里奥尔语机制等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相关

专题讨论(杨永林，2000,2002a,2002b,2004a,2004b)。

**7.2.4** **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启示**

在过去的50年里，社会语言学获得了迅猛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 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理解。随着学科的发展，其学术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 确认。随着学术的繁荣，衍生出了新的姊妹学科“应用社会语言学”(Applied Sociolinguistics)(Trudgill,1984), 社会语言学应用型学科的特色，由此也 得以凸显。下面结合外语学习课堂、法庭语境、医院诊所的语言使用问题，简 述其应用型的特色，拓展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首先，介绍社会语言学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社会语言学对于语言教学的 影响，可以从“传统教学方法有何不妥?”这个问题的提出得以体现。对于这 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外语教学理念——外语教学的目的是 培养“学院式的语法学家”还是“活生生的语言使用者”?“在传统的外语课 堂里，语言学习如同历史学习和数学学习一样，被看作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 最终的训练结果是，学生像语言学家一样，掌握了一些关于语言的知识，但是 对于鲜活的语言事实却知之甚少”(Berns,1990:342) 。20 世纪70年代以来， 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 “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理 论的提出，形成了对传统语言教学方法的严峻挑战。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在 外语学习的课堂里因此得到了重视。教学的目的是要把学习者培养为成功的 语言使用者，而不是只懂语法规则的语法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语言 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对广义的语言教学产生了作用与影响：

1)促进了语言教学内容与重点的改变；

2)有助于教材内容和教学活动的创新；

3)为卓有成效的教学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

4)为研究语言使用与语言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野。

其次，还有必要了解一下社会语言学在法庭语境中的应用。在过去的30 年里，语言与法律之间关系的研究，为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广泛应用提供了一片 新天地，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就。语言学家通过对语言类证据的分析为案件判 定提供参考证据的做法逐步得到接受，对法庭证据的甄别与鉴定起到了辅助 作用。同时，社会语言学家同立法工作者协同工作，制定法律文书，为提高法 律文书的可读性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得到了鼓励与认可(Fasold,1990) 。 此 外，法庭语境中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反过来又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权势与 语言关系的理解，为研究社会语境中说话人的言语变体提供了难得的语料素 材。显而易见，在法庭这个特殊的社会语境中，何时提问、谁来提问、如何提 问，何时陈述、谁来陈述、如何陈述，都有定数。权势语言变体与弱势语言变 体的选择受到制度性条文的制约，都带有“约定俗成”的社会语义(O'Barr &

Atkins,1980)。

最后，再来看看社会语言学在医院诊所语境中的应用情况。在过去的40 年里，医生与护士的对话、医生与患者的对话，引起了社会语言学家的兴趣。 同法庭语言研究一样，在医院诊所语境中，广义的权势要素通过不同语言形式 的表现得以凸显，反映出社会的等级观念，隐含着不同语用策略的使用。通过 考察医护、医患双方的话语模式，可以揭示出在这一特殊语境中，社会因素是 如何通过语言的使用影响到话语群体的言语行为的；通过合理的分析，社会语 言学为这种语言行为的成因提供了一种较为全面的、科学合理的解释。

**7.3** **跨文化交际**

在全球化思潮的促动之下，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 焦点问题，获得了充分的重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国际事务交往中， 文化误读的现象层出不穷，时有发生。心理学家罗杰斯(Rogers,1961) 声称， 真正的交流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倾听。反过来或许也可以说，缺乏理解的倾 听不会产生真正的交流；缺乏理解的交流还会导致谬解，进而引发冲突。众所 周知，语言在日常交流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使得 跨文化交际研究充满了困难与挑战。面对这种情况，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些言 语交际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次，通过跨文化交际中误读实例的分析， 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促进全球化语境中言语交际问题的研究。不言而喻，“国 家走出去，语言必先行”的论断，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着重要的启 示作用。跨文化交际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7.3.1** **跨文化交际的原则**

文化误读不仅仅是跨文化交际中才可能出现的问题，违反基本交际原则， 同一文化群体的交流也会出现误读问题。不了解交际常识，跨文化交际更是

困难重重，无法进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 一 些基本原

则，有助于构建更为健康的话语模式，促进双方的沟通，降低交流的成本，提 高“以言成事”的效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采用心理学家罗杰斯(Rogers, 1961)提出的“三大交际原则”,作为本小节讨论的基本框架。罗杰斯提出的 三大交际原则可以简约归纳为：1)学会从对方的角度看待事物；2)学会从对 方的角度感受事物；3)学会从对方的角度了解世界。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采取交际心理与语用意象相结合的视角，考察跨文化 交际中的一些问题。罗杰斯的三大原则反映了交际心理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 用。语用意象体现了一种语用哲学的理念。这是因为“交际本身具有意象交

际的特征，也就是格赖斯所谓的‘非自然意义’”(Berge,1994:614)。 根据 这些原则与理念，结合跨文化交际问题的讨论，我们提出了三点建设性原则， 用于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难题：

1)成功的交际，要求能从对方的角度看待、感受、理解问题；

2)成功的交际，要求话语双方对于彼此意图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3)成功的交际，要求话语双方采用互动式而非独角戏式的对话模式。

**7.3.2** **个案研究**

在现代社会中，得体有效的交际行为是成功的要素之一，其重要性在双语 和多语语境中的作用日益彰显。在跨文化语境中，交际的成功带来财富、和平、 发展机会；交际的失败招致偏见、冲突、敌对局面。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 全球化所构成的“新四化”,极大地丰富了现代人的生活。与此同时，跨文化 语境中交际活动与日俱增，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教训。了解这方面的 知识，掌握应对策略，既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又能繁荣新时期的 语言学研究，是学好社会语言学、用好社会语言学的动因之一。为此，我们准 备了几个个案研究，供大家参考比较。

1. 入乡随俗

不同语言表达不同，语义选择彼此互异。汉语可以随意言说之物，英语中 不一定有对应之说。跨文化交际语境中可以找到大量类似的实例。其中，代 词用法、称谓形式、问候表达在跨文化交际中经常会引发一些令人头痛的问题。 表7-1总结了六种人称代词形式。这些代词形式存在于不同语言之中，具有 普遍性的特征(Ingram,1978:219)。

**表7** **-** **1** **人称代词形式**

|  |  |
| --- | --- |
| 单数 | 复数 |
| 我 | 我们 |
| 你 | 你们 |
| 他 | 他们 |

同其他语言相比，现代英语的代词对称形式有其独特的一面。在大多数 欧洲和亚洲语言中，代词对称系统不但可以表示单复数的选择，而且还可以体 现话语双方的社会关系，形成“远近亲疏、尊卑长幼”这样一种多元语义对立 (Yang,1988) 。 在现代汉语中，这种社会语义的区分是通过“您”或“你”的 形式选择而得以实现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英语却没有相应的表 达，虽然这种语义与形式上的对立在莎士比亚时代还依然普遍存在。例如，《第 十二夜》中就有这样一句台词：“你把他你呀你的你上三次，他绝对会怒气冲

天”(Twelfth Night,Act 3,Scene 2,50-51)。18世纪以后，英语中的这种 区分逐渐消失。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现代英语如何体现这种社会语义?《简 爱》第一章里有一段对白，说明同一个you 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具有不同的引申 含义：

"What do you want?”I asked,with awkward diffidence. (“你要干 什么?”我用略显不安的冷淡问道。)

“Say,'What do you want,Master Reed?'”was the answer.( 我 得 到 的回答是：“你得说‘您有何吩咐，里德少爷?'”)

由此可见，现代英语虽然没有了“您”和“你”之间的形式区别，但是通 过语言自偿手段，如 “you + 称谓”的方式，也可形成相应的语义区别。例如 在美式英语里，可以通过不同称谓形式和句式表达的选择，体现话语双方的社 会距离(Hook,1984:187):

1)我是琼斯先生(姓氏+头衔，强调正式与礼貌)。

2)我是琼斯(单用姓氏，表示正式与礼貌)。

3)我是约翰(单用名字，表示熟悉与亲近)。

除了代词、称谓、姓氏的选择用法，在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中，如何选取得 体的问候说法，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两个英国人见了面，大概会谈到天 气如何。

A:It's a nice day,isn't it?(今天天气不错，是不是?)

B:Yes,its such a warm day!(可不是，够暖和的!)

在同样的语境中，中国人可能会说：“你/您去哪里?”或者“你/您吃了 吗?”由于文化的不同，中国式的问候对于西方人来说显得“太个人”“太私密”, 多少还有点多管闲事的嫌疑。大名鼎鼎的英国《卫报》曾经刊登过一篇专栏文 章，谈到中英问候语的文化差异。这篇短文文笔简洁，读来有趣，节译如下， 以资参比(Xin Ran,2005)。

**以食谈天**

同英国人聊天，如果没有要紧的话题，不妨从天气谈开。同中国人聊 天，如何开腔?自然会从食物或健康谈起。

“你吃了吗?”是汉语中最常见、最要紧的问候语。这句话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都管用，三更半夜碰到路人，问问也没错。听话一方简单回应一 声“吃了”就可以了，无须再言哪里吃的、吃了什么。 一声“吃了”,既可 表示日子过得滋润，不愁没饭吃，也有别无可谈、要事缠身、无暇多聊的 意思。回应一声“没吃”或者“你呢?”,意思就不一样了——吃不吃不

重要，重要的是想聊聊。如果还想谈谈其他事情，可以接着问上一句“咋 还没吃?”

西方人不理解食物与健康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热门话题的原因。 实际上，这反映了一个沿袭了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据我所知，五百年前就 有统治者告诫臣民可说什么、可做什么的历史记录 ……

有一点还得说说。英国人历来文明有加，衣食无忧。可我就是闹不 明白，为什么偏要选定天气作为说事的开端(引子)。

**2.换位思考**

面对重要事件与重大抉择，跨文化交际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 正确把握对方此时此刻的想法、充分理解对方此时此刻的感受、准确预见对方 将要采用的行动。不过，要培养这样一种准确判断，养成这样一种先见之明， 绝非易事。只有通晓对方语言，熟知对方文化，了解对方“国情民性”,谨慎 行事，避免莽撞，才能奏效。下面介绍的是跨文化交际中一个“代价昂贵”的 误读实例(Stewart,1983), 说明真正的交流，是建立在对于目的文化、目的 语言、目的社会整体了解基础之上的“通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英、苏四方联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 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公告发表之后，日本首相铃木在接见新闻界人士时 说，日本内阁对于波茨坦公告采取一种“默殺”政策。他原本要表达的意思是 “不加评论”,但是，“默殺”一词在日语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既可以解 释为“不加评论”,又可以理解为“不予理睬”(杨永林，2004b:59-60)。 由 于文化差异的缘故，盟国新闻社的译员在翻译铃木首相的讲话内容时，选择了 后一种意思，译为英语的ignore 。 国外有评论家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上的 误读，最终导致美国政府做出了投掷原子弹、迫使日本政府投降的决定，成为 历史上代价最为昂贵的“误译”之例。语言学家斯图尔特(Stewart,1983) 在 解释其中的原因时声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日本民族遇事往往深思熟虑， “默殺”一词便暗含“延缓决定”的意思。而美国人做事果断，所以在翻译“默 殺”一词时，选取了“不予理睬”的义项，译为英语的ignore, 于是“默殺”就 有了do not pay attention的解读。实际上，英语中表示“延缓决定”的说法有 很多，既可以用put aside,delay decision, 也可以说ignore until deliberations are completed。但是在任何情况下，ignore 都不含“延缓决定”这一层意思。 上述误译现象，显然是一种基于美国文化的文化误读。

3.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谚语集语言、文化、社会之大成。跨文化语境中的谚语研究，不但有助于 了解不同的价值观念，也有助于了解对待动物的不同看法。英语中有“Love me,love my dog”(爱我及狗)的说法，中国有“爱屋及乌”的说法。两条谚

语表示了两种文化对于不同动物与人类关系的看法。不了解其间的差异，也 会导致不快，甚至误解。不同文化对不同宠物的态度，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 爱，难求一致。英美文化对于宠物狗的概念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如果不加区 别生搬硬套，也会引起麻烦。有例为证。

2003年早春，“中电通信”(CECT) 的手机用户打开手机，注意到屏幕上 映现出两个英语单词 “Hello,Chow” 。 有细心用户查阅了词典，发现 “chow” 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松狮犬”或“雄狮狗”,于是便将查询结果诉诸报端。这 条消息一经报纸转载，引发了众怒，一致认为这条问候语有戏弄用户之嫌。短 短几天之内，电讯公司收到无数投诉，要求给公众一个说法。为此，公司专 门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解释说本款手机是针对年轻女性开发的一款新机型。 “Hello,Chow” 就像 “Hello,Kitty” 一样，不过是英语中的一句问候语，作为 研发单位，绝对没有冒犯用户的意思。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此次事件 的起因是将异域文化的内容直接移植到本土文化，没有考虑到两种文化对于 “chow” 一词的不同理解。英文里以犬喻人没有太大的问题；中文里以狗喻人， 多半含有侮辱之义，属于语言禁忌之列。由此可见，不了解社会的习俗、文化 的差异、语言的不同，就无法真正完成跨文化交际。更有甚者，还会形成谬见， 造成负面影响。

下面的短文说的是几个中国女留学生在美国纽约市的不快经历。问题的 焦点还是落在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之上。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托福”考试 得高分，并不意味着同时也获得了得体使用英语的能力。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 “Hello”, 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引发文化误读，造成负面影响。这篇短文文字 简明，不作翻译，便于大家感受文化之不同。

**What Is Wrong with Their“Hello”?**

A group of Chinese girls who just arrived at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ir university education decided to visit the city of New York together.

Since their school was not very far from the city,they planned to take a Greyhound bus to go there at weekend.

Saturday morning,they got up early and after two hours'drive they got to the downtown of the city.They stayed there for a couple of hours, shopping and sightseeing happily.Everything seemed OK until it was the time for them to go back —they suddenly realized that they lost their way back to the Greyhound bus station.What made the situation worse was that it was getting darker.

In despair,they stopped at a corner on the street and decided to ask for help.At this moment they saw a young couple passing by so they

said“Hello!”to this couple.To their surprise,the couple looked at them coldly and hustled on.Having no way out,they approached to the next group of passers-by and tried a louder “Hello”this time.Again they got nothing but a cold shoulder from these city people.

故事讲到此，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明白了这些留学生遭遇白眼的原因 了 不是语言问题，而是语用错误。英美文化中，身处公共场所语境，如要 引起他人注意、寻求帮助之时，要用“Excuse me”而非“Hello”。由于缺乏对 这种文化差异的认识，这些女生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使用了错误的开腔 话语，而被误认为是街头女郎，遭人白眼，境遇尴尬。

以上研究表明，一种语言形式在不同的语境中有可能获得完全不同的社 会含义。面对这种困惑，在跨文化交际中有必要遵循一条社会语言学的定律， 弄清楚“什么人对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什么时候，说什么”的问题(who speaks[or writes]what language[or what language variety]to whom and when and to what end)(Fishman,1972:46)。

4.贵在真诚

长久以来，学术界一直思索着“东西文化何处交汇”的问题，并试图给予 明确的解答。实际上，跨文化交际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充满了误读与误解 的陷阱。因此，不论是对于语言学家来说，还是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要实现 这个美好的愿望，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面对这种困境，大家难免要问： 出路何在?我们认为，丰富的交流经验、充分的文化意识、良好的语言水平， 是保证跨文化交际的前提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跨文化语境中，态度决定一 切。真诚相待才是跨越文化鸿沟、通往理解彼岸的桥梁与纽带。

**7.4** **文化与标识**

新世纪以来，随着北京奥运会(2008)、上海“世博会”(2010)、南京“青 奥会”(2014)的成功举办，中国语境中的双语标识问题，不但引起了各级政 府、管理部门的重视，同时也成为社会语言学家关心的问题。北京、青岛、南 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等地，相继推出了中文标识英文译写的地方标准。 针对我国双语标识中普遍存在的不规范现象，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教 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织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启动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 译写规范”研究项目，旨在加强中国语境中外语用语的标准化、规范性的研究。 可喜的是，这个项目的成果作为国家标准于2017年6月正式颁布了。

双语标识译写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除了语言的规范之外，文化的问题也 是标识译写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杨永林，2012)。这方面的实例很多，以

下以条件句和委婉说法为例，说明文化在标识 译写中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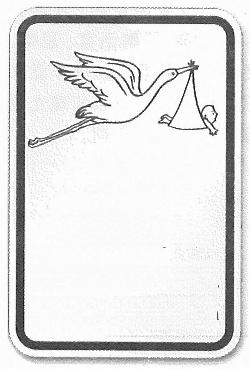
翻译条件句，英语里一般使用if引导的从 句，这是常规的做法，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 标识翻译中，“条件”的概念一般都用in case of 来表达。例如，“如遇火情，勿乘电梯，请 走逃生楼梯”的标准翻译是"In Case Of Fire, Do Not Use Elevators.Use Stairways"。又如，

“如遇地震，朝高地或内陆方向疏散”的通用

说法是“In Case Of Earthquake,Go To High Ground Or Inland”。究其原因，

是因为标识的主要功能是“告示与警示”,所假设的内容都是一些极端情况。 在这种情况之下，使用in case of不但言简意赅，而且包含了“如果发生此类 极端情况”的文化含义。这层意思显然不是if从句所能概括的。

“产妇孕妇专用车位”是停车场中常见的一条标识。这条标识，北美规范的说 法是“Reserved Parking For New Mothers &Mothers To Be”。在这条英文标识中，



**STORK**

**PARKING**

**For New Mothers &Mothers To Be**

new mothers和mothers to be都是一种委婉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表达“怀孕”或者“孕妇”的意思， 除非在医院透视室或工厂放射物区域，英美标识 中一般不用pregnant 这个字眼。令人遗憾的是， 中国语境中的双语标识中却经常出现“Seats For Pregnant Women”( 孕 妇 专 座 ) 或 者“Reserved Parking For Pregnant Women” 之类的说法。中 国文化中有“麒麟送子”的故事，英美文化中有 “鹳鸟送子”的传说，所以“Reserved Parking For New Mothers &Mothers to be”这条标识，也可改 写 为“Stork Parking For New Mothers &Mothers To Be”。

**7.5** **总结展望**

综上所述，考察语言、文化、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必要采用一种“与 时俱进”的生态化观点。新世纪之初，乔姆斯基和哈佛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发 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标题为《语言能力：何为语言能力?谁拥有语言能力?语 言能力由何而来?》(Hauser,Chomsky &Fitch,2002)。这篇里程碑式的论 文明确提出，语言学研究有必要采取多学科、进化论的视角，才能产生新的理 论贡献。这篇文章还表明，在语言学研究中，有必要区分“广义语言能力”和

“狭义语言能力”之间的异同。“广义语言能力”包括感觉运动系统、概念意念 系统，以及递归运算机制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从有限元素组群 生成无限表达方式的可能；“狭义语言能力”仅含递归特征，构成了人类语言 独特的语言能力。有理由认为，“广义语言能力”有可能来自于语言之外的进 化动因。因此，语言学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比较的视野，通过与生物学、心理 学以及人类学联袂的方法，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假设，找出形成语言能力配 置的进化动力。新世纪的理论语言学研究如此，作为跨学科研究的社会语言学， 更应当体现一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和“格物致知”的传统。

在本章的讨论中，我们通过语言、文化、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介绍 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要点与应用范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社会语言学在50 年的发展过程中历经风雨，终成气候，得以广布。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 语言与文化、社会关系的研究，在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中，更是一项具有挑战 性的工作。这种挑战性主要体现在这种研究所必需的多学科知识储备。要想 做好社会语言学研究，有必要学一点人类学的知识，了解一些社会学的理论， 懂得一些认知科学的原理，学会一些心理学的方法，知晓一些民族学的内容 (Rosch,1977)。 知识积累只是一个方面，还要具有创新发展的意识，才能有 所作为。跟踪学科前沿动向，转变思想观念，采取多维视角，了解语言、思维、 文化、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都是创新发展的基本要求。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社会语言学研究既是一条充满了困难与挑战之路，也是一条实现光荣 与理想之路—— 放眼看去，风景这边独好；展望未来，事业未有穷期。